

[法] 安妮·埃尔诺 著 陈淑婷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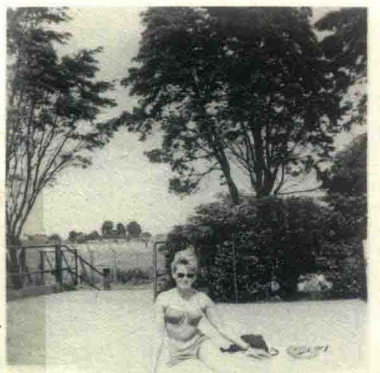
一个女孩的记忆

Annie Ernaux

Mémoire

de

fille



· 2022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nie Ernaux

-
*Mémoire
de
fille*

一个女孩的记忆

〔法〕安妮·埃尔诺 著

陈淑婷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女孩的记忆/(法)安妮·埃尔诺
(Annie Ernaux)著;陈淑婷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
版社,2022
ISBN 978-7-208-17833-5

I. ①—… II. ①安… ②陈… III. ①自传体小说—
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136840 号

责任编辑 赵 伟

装帧设计 林 林

一个女孩的记忆

[法]安妮·埃尔诺 著
陈淑婷 译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01 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 159 弄 C 座)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4.75
插 页 5
字 数 85,000
版 次 202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7833-5/I·2034
定 价 48.00 元

所获赞誉

这本书被缩减到一个强烈的内核——不是忏悔，而是一种个人认识论。……阅读埃尔诺的书的一种方式是试图理解那种不透明的、痛苦的、本质的“成为”过程。

——《纽约客》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安妮·埃尔诺在法国文学圣殿中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因为她不仅有能力挖掘个人的记忆，而且有能力展示它们与集体经验的微妙互动方式……现在，英语读者也开始追捧。

——《纽约时报》

《一个女孩的记忆》是对时间在我们现在的自己和曾经的自己之间竖起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墙的深刻而美丽的审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书能如此生动地描述这堵墙的挫折和诱惑，以及我们在试图突破它时的心痛和渴望。安妮·埃尔诺是我最喜欢

的当代作家之一，具有原创性和真实性。在读完她的书后，我总是在她的世界里走动几个月。

——希拉·赫蒂，《母性》和《人应该怎么过?》作者

法国当代著名作家埃尔诺，对她的羞耻感进行了很好的挖掘。她的写作中没有歇斯底里，也没有矫揉造作；她准确地处理她的个人历史，从不感情用事……对作家来说，重新审视痛苦时期不是什么新领域，但埃尔诺从这种做法中提炼出一种特殊的力量。正如她所说的，“关于羞耻的记忆比任何其他记忆都更加细致，更加让我不知所措。这种记忆是羞耻的特殊馈赠。”

——《纽约时报书评》

《一个女孩的记忆》写于2013年，虽然几年后才问世，但作为一种叙事体裁，它早于Me Too。埃尔诺的作品讲述了Me Too为女性提供的最简单也可能是最好的东西。这是她的根本要求：如何以集体形式在政治上记忆。……通过超过40年和21本书（几乎都是短篇的、以主体为导向的记忆）的个人化写作，埃尔诺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国文学的稳定，并重塑了这种类型。

——《国家》杂志

安妮·埃尔诺的回忆录写得如此真诚和脆弱，以至于我发

现在读完之后，很难将自己的记忆与她的记忆分开。在《一个女孩的记忆》中，她梳理了一个充满欲望和羞耻的青春期，一个内部和外部都被贬低的时代。埃尔诺明智地涉足了她记忆中的灰色地带；她没有试图超越它们，甚至也没有试图“理解”它们，而是将它们牢牢地压在这本钻石般的书中。

——凯瑟琳·拉塞，《皮尤》和《答案》作者

在这本极具破坏性但却简单易懂的自传作品中，安妮·埃尔诺在她记忆的残骸中进行筛选，质疑它的性质：我们是否拥有它，构建它，或像照片一样看待它；长期被压抑的记忆是否可以作为叙事而复活和重构——在这样的行为中，作者在哪里结束，作者的角色在哪里开始。她问道：“如果记忆不是一种知识的形式，那么驱动我的信念是什么？”在《一个女孩的记忆》中，埃尔诺巩固了她作为一名具有深度和优雅的作家的地位。

——萨拉·杰拉德，《阳光之邦》作者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但请告诉我，我是谁。

超级流浪汉乐队（Supertramp）

还有一件事，她说。我不为自己做过的任何事情感到羞耻，爱并且说出来，并没有什么可耻的。

可这不是真的。对于自己的软弱、文字、爱情的耻辱感持续吞噬着她，啃食着她，直到生命的尽头。

说到底，这一切并没有那么痛！不至于不能默默忍受，不表现出丝毫。这都是经验，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她现在可以写一本书，罗迪会是其中的一个角色；或者，她可以认真地进军音乐界；抑或是，自杀。

罗莎蒙德·莱曼（Rosamond Lehmann）

《尘埃》

目 录

所获赞誉 1

一个女孩的记忆 1

一个女孩的记忆

有些人沉溺在别人的世界里，关注他人说话、交叉双腿、点烟的方式，活在他人的影子里。某天，更确切地说，某夜，他们被他者的欲望和意志牵着鼻子走，他们自己的所思所想都烟消云散了。他们丢失了自我，眼看着自己被支配、被拖入未知的进程中。他们的想法总是落后于他人，他人总是能占据先机，而且他们永远也追不上。

既不屈服也不认同，只是害怕现实，忍不住念叨“我发生了什么”，或者“只有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除了这种情况，其他时候我是不存在的，或者不是同一个我。只有他者才能掌控时局、姿态和接下来的时刻，而且只有他自己对此了如指掌。

然后他者消失了，你不用再取悦他，他对你失去了兴趣。他把你抛弃在赤裸裸的现实里，就像一条脏内裤。他只关注自己的时间，而你已经习惯了服从，在没有主人的时候，形单影只。

于是，其他人乘虚而入，填补你的虚空，你不会拒绝他们

任何事情，因为你好不容易才体会到他们的靠近。你在等待主人，希望他能给予你恩赐，至少碰你一次。某一天晚上，他这样做了，在你身上驰骋，这正是你苦苦哀求的。转天，他就消失了。这不重要，找到他已经成为你生活、穿着、自我提高、考试成功的理由。他会回来，你会配得上他，更甚至，往日那个没有存在感的你，现在变得美丽大方、学识渊博、自信满满，这些足以让他对你刮目相看。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默默地以身相许的那个主人。但是，在你努力提升自己价值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你已经不可避免地远离了他。你审视自己的疯狂，你不想再见到他。你发誓会忘记一切，永远不会告诉任何人。

那年夏天，气候没有任何异常，戴高乐将军回归，推出了新法郎，建立了新的共和国，贝利夺得世界杯冠军，查理·高卢（Charly Gaul）获得环法自行车赛冠军，达琳达（Dalida）唱了《我的故事是一段爱情故事》。

那是一个漫长的夏天，就像 25 岁前的任何一个夏天。之后的夏天变得越来越短，记忆变得模糊不清，只记住了干旱异常、酷暑难耐的夏天。

1958 年的夏天。

和往年的夏天一样，一小部分家境优裕的年轻人和父母一起到蔚蓝海岸晒太阳，另一部分同样富裕、在高中或者在圣-让-巴蒂斯特-德-拉-萨勒教会学校就读的年轻人，乘船前往迪耶普（Dieppe），练习学了六年的哑巴英语。还有一部分人，诸如高中生、大学生、小学教师等，他们假期很长，钱很少，会去在法国各地大型住宅或者城堡举办的夏令营看管孩子。无论走到哪里，女孩们都在手提箱里装一包一次性卫生巾，既担心又期待，想知道是否在这个夏天她们会第一次和男孩睡在一起。

那年夏天，特遣队的数千名士兵大多也是第一次离开家乡，前往阿尔及利亚恢复当地秩序。他们写了几十封信，讲述北非的炎热气候、山地、乡镇，以及被占领百年依旧不会说法语的阿拉伯“文盲”。他们发回了自己和朋友穿着短裤，在干燥、多岩石的风景中大笑的照片。他们像是童子军在探险，你会以为他们是在度假。女孩们什么也不问，仿佛报纸和广播上报道的“战斗”和“伏击”与他们无关。她们觉得他们履行作为男孩的职责是很自然的事情，正如那个传言，他们需要一只山羊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在她们看来，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他们休假回来，带回来项链、法蒂玛之手和一个铜托盘，然后又走了。他们唱起《退役的那一天》，改编自贝考（Bécaud）的歌曲《下雨的那一天》。他们最终回到了四散在法国各地的家，不得不结交新朋友，而这些朋友没有去过北非，没上过战场，不会谈到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士或北非阿拉伯人。他们与现实脱节，沉默寡言。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对是错，是应该感到骄傲还是羞愧。

1958年的夏天，她没有留下任何照片。

甚至连在夏令营庆祝的十八岁生日都没有照片。她是最年轻的辅导员。生日那天她正好休假，所以下午有时间去市区买起泡酒、拇指饼干和夏蒙尼牌橙汁，但只有少数人去她的房间喝了一杯，吃了些点心，并且他们很快就离开了——也许她不是他们常来往的人，或者只是觉得没意思，因为她没带唱片，也没带电唱机来夏令营。

1958年的夏天，在奥恩省S市夏令营遇到她的所有人中，有谁记得她这个女孩吗？应该没人吧。

他们忘记了她，忘记了彼此，9月底大家就都散了，回到了自己的高中、小学教师师范学校、护士学校、体育教育中心，或者被召唤加入了赴阿尔及利亚特遣队。大部分人都很满意这个看管孩子的假期，既挣到了钱，又获得了心灵上的满足。但她，作为一个异类，总是背道而驰、乱七八糟，应该会更快地被遗忘吧——让这些可笑的事情来增加记忆的负担是很荒谬的。在他们1958年夏天的记忆中没有她，而当年的记忆如今可能已经渐变成模糊地方的模糊轮廓，只剩下“夜晚地下室舞厅的黑人大战”和“未知的停演”，那是他们最爱开的玩笑。

因此，她从其他人的意识中消失了，从所有那些与奥恩省的这个确切地点有关联的意识中消失了。就在这个夏天，这些人评估他人的行为、表现、身体的诱惑力，尤其是她的身体。他们评判她，排挤她，一听到她的名字就耸耸肩或翻白眼，他们中的某个人因为找到了跟她名字有关的双关语而洋洋自得：安妮，你的身体在说什么（安妮·科迪^[1]，哈哈！）。

她被其他人彻底遗忘了。这些人散落在法国或世界各地，已婚，离婚，独身一人，抑或成为祖父母，已经退休，头发花白或者染了头发。物是人非。

我也忘记那个女孩。真正的忘记，就是不再想书写她，不再认为必须书写她，叙说她的欲望，疯狂，愚蠢与骄傲，饥饿与停经。可是我做不到。

日记里总有一些句子，暗指“S市的女孩”“1958年的女孩”。二十年来，我不断地在写作计划中写下“1958”。这本书至今仍未撰写，反复列入写作计划。无法形容的空白。

每次都是只写几页，除了有一次，那一年的日历与1958

[1] 安妮·科迪（Annie Cordy），比利时演员、歌手。她的姓“Cordy”同法语“corps dit”（身体说）发音相同。——译注

年的完全一致。2003年8月16日星期六，我提笔开写：“1958年8月16日星期六。我穿着花5000旧法郎买的一条牛仔裤和一件蓝白相间的横条纹无袖毛衣。这条牛仔裤是从玛丽—克洛德那里买到的，而她是花了10000旧法郎从鲁昂的埃尔达商店买到的。这是我最后一次拥有自己完整的身体。”我每天都奋笔疾书，试图让写作的日期与1958年的日期完全吻合，我乱七八糟地记下了所有重现的细节。仿佛这种每天不间断的周年纪念写作方式最有可能跨越四十五年的间隔，仿佛因为这种日期的“日复一日”，写作让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直接回到那个夏天，就像从一个房间进入到另一个房间一般简单。

由于画面、文字的涌入，写作需要不断延伸，很快，我的写作进度就落后于1958年各种事情发生的时间。我无法将1958年夏天的时间塞进2003年的日历中，它不断地溢出我。我越写越感觉自己写得不贴切。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些文字应该以另外一种状态呈现，但是我不知道应该是怎样的状态。我也没有寻找这种状态。其实，我只是单纯地享受释放记忆的快乐。我不愿意因形式而痛苦。五十页后，我又停笔了。

十多年过去了，又过了十一个夏天，与1958年的时间间隔增长到五十五年。1958年，连同那些战争、革命、核电站爆炸，一切都在被逐渐遗忘。

摆在我面前的时间越来越短。必然会有最后一本书，就